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影响*

梁益坚 王 瑶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其人口规模和比例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并表现出增速快、范围广和潜力大的显著特点。该群体崛起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非洲地区独立自主发展战略为中产阶级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政治相对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为中产阶级的崛起提供了前提条件；经济持续增长和私营部门繁荣是中产阶级崛起的核心动因；基础设施改善和生育率降低等社会发展因素构成中产阶级崛起的“催化剂”；减贫成效显著成为中产阶级崛起的“加速器”。中产阶级崛起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强劲内生动力已经并将继续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融合产生积极影响，助力非洲本土民主、非洲制造和本土文化的发展繁荣，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当然，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反噬其崛起本身。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的浮动阶层仍然较为脆弱，存在返贫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发展基础，延续其增长态势。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济发展 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梁益坚，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瑶，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助教。

百年变局下，全球财富分布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并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百年变局下非洲中产阶级的新动向及中国应对研究”（23XGJ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袁帆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

断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① 2000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②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其中产阶层的比例和数量也表现出迅速扩大的发展态势。中产阶层的崛起被视作非洲发展的新引擎，是非洲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动能，是当代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里程碑。^③ 因此，加强对现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阶层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阶层的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三类：其一，从历史和社会文化视角进行研究，主要关注非洲中阶层在去殖民化时期与 2000 年以来的差异和变化。弗朗茨·法农的著述分析了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洲中阶层现象，他认为该群体是原殖民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中间人，是旧殖民体系的附庸和新治理体系的受益者，其群体主要是社会精英、公务员、外企雇员以及部分国企员工；^④ 迈克尔·洛奇则认为，2000 年以来的非洲中阶层是一个“新阶层”，因其群体范围更广、人口规模更大而能够有力促进本土消费市场的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到欧美国家去消费。^⑤ 其二，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聚焦非洲中阶层取值标准的设定和人口规模的计算。非洲开发银行在 2011 年的研究报告《金字塔的中间：非洲中阶层的动态》中，结合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标准，将人均日消费 2 ~ 20 美元作为非洲中阶层的测算标准，结合“全球贫困在线”数据库（PovcalNet）测算出 2010 年非洲地区约有 3.26 亿人为中阶层；^⑥ 希梅莱斯等学者将家庭资产作为衡量中阶层的测算标准，使用“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库（DHS）中 1990 ~ 2011 年 37 个非洲国家的资产数据，得出结论：非洲国家中阶层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中阶层正在迅速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2013, p. 14; Homi Khara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Working Paper No. 285, 2010, pp. 17 - 29.

② 本文采用非洲联盟的地区划分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除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六国以外的 48 个非洲国家。

③ L. Kroecker, D. Kane and T. Scharrer eds., *Middle Classes in Africa: Changing Lives and Conceptual Challeng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 58; M. Neube and C. L.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1.

④ F.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London: Penguin, 2001, pp. 120 - 121.

⑤ M. Lofch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frican Middle Class”, in M. Neube and C. L.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p. 70 - 100.

⑥ AfD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2011, pp. 1 - 5.

崛起，并预测从2013年到2040年非洲中产阶层的数量还将增加一倍以上。^①其三，从国别视角进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分析尼日利亚、莫桑比克、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中产阶层的变化情况和特点。奥瑞基认为，城市化、教育、私营部门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尼日利亚中产阶层的扩大。^②苏米奇从历史的角度以莫桑比克为例，驳斥了“中产阶级扩大是新自由主义产物”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扩大是非洲地方治理和历史结构变化的产物；^③斯普朗克在对肯尼亚城市中产阶层（会计师、律师和记者等从业群体）进行走访调研后认为，教育投入和辛勤工作是肯尼亚中产阶级扩大的重要原因；^④舒勒对坦桑尼亚民众进行了访谈，其中7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5%的认为自己是富裕阶层。^⑤综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比较、趋势研判和国别研究等方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细致分析不够，对该群体规模、国别情况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等内容系统分析不充分。基于此，本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的发展态势、主要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以期深化此议题研究。

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界定与计算标准

尽管2010年以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研究文献不少，但对该地区中产阶层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国别数据情况的全面研究还有所欠缺。鉴此，重新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并使用世界银行新修正的国别数据颇为重要，并可据此研判该地区中产阶级动态和发展特点。

（一）中产阶层的内涵

中产阶级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通常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

① A. Shimeles and M. Ncube,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 Class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DHS Dat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51, No. 2, 2015, pp. 178 - 193.

② N. Orji, "Middle Class Activism in Nigeria", in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London: Zed Books, 2016, pp. 129 - 142.

③ J. Sumich, "The Middle Class of Mozambiqu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lank Slate", in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pp. 159 - 169.

④ R. Spronk, "Exploring the Middle Classes in Nairobi: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Sophistication",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7, No. 1, 2014, pp. 93 - 114.

⑤ V. Shule, "The Middle Class of Dar es Salaam and Kiswahili Video - films", in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pp. 194 - 195.

个层面进行定义。在政治特征层面，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维持政治稳定、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群体。在经济特征层面，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新消费主义”（New Consumerism）观念、追求更高生活品质、消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意愿明显高于贫困阶层的群体。在社会特征层面，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拥有共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群体，主要由商人、政府官员、专门职业者以及一些农民和技术工人等人员组成。因此，中产阶层也常被看作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社会融合的主体。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衡量标准

中产阶层的计算标准一般使用相对值算法和绝对值算法。相对值算法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某国收入中间值的 50% ~ 150% 或 75% ~ 125% 作为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例如，瑟罗和伯索尔等学者使用这一方法界定美国中产阶层。^①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显示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也难以捕捉新增的中产阶层数量的细微变化；另一种方法是将收入五分位数的中间 3 个或收入十分位数的中间 7 个视作中产阶层。该方法的缺点是假设收入分配恒定不变，导致其对绝对收入和收入分配变化不敏感。绝对值算法主要使用收入或消费的绝对值作为取值区间，在该数值区间的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层。这种方法具有标准统一、计算简便和易于比较的特点，在国别比较分析中具有明显优势，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内各国中产阶层的比较研究。但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时间维度的不同，其取值区间也会有所不同。例如，2002 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和以色列经济学家伊扎克将中产阶层定义为生活水平位于巴西和意大利这两国的平均水平之间的群体（即每天消费 10 ~ 20 美元的群体）。^② 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层定义为每天消费 2 ~ 20 美元的群体。^③ 2008 年美国经济学家班纳吉和杜弗洛将每天消费 2 ~ 10 美

^① L. C. Thurow, “A Surge in Inequ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56, No. 5, 1987, pp. 30 - 37; N. Birdsall, C. Graham and S. Pettinato, *Stuck in a Tunnel: Is Globalization Muddling the Middl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Working Paper 14, 2000.

^② B. Milanovic and S. Yitzhaki,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 Clas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48, No. 2, 2002, pp. 155 - 178.

^③ ADB,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 The Rise of Asia's Middle Clas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ugust 2010, p. 5.

元的人视作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① 2009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瓦雷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区分开来，他以各国2005年购买力平价数据作为计算基础，将每天消费2~13美元界定为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② 这里的下限2美元代表70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间值，上限13美元代表2005年购买力平价中的美国贫困线。2011年非洲开发银行在研究报告（即《金字塔的中间：非洲中产阶级的动态》）中采用了绝对值算法的计算标准，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数据作为计算基础，将每天消费2~20美元确定为非洲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并将非洲中产阶级划分为3个阶层：“浮动阶层”——每天消费2~4美元、“中下阶层”——每天消费4~10美元和“中上阶层”——每天消费10~20美元。^③ 该绝对值算法的缺陷是，各个时期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不能长期固定不变，需要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对取值区间进行动态调整。

基于国别比较的方便和贴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实际，本文采用非洲开发银行的计算标准，使用每天消费的绝对值算法来界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由于非洲开发银行在2011年研究报告中的取值区间（每天消费2~20美元）是根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数据确定的，距今已过去较长时间，需要进行动态调整。鉴此，本文根据2011年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计算非洲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将非洲国家“美元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每一美元的本币单位）指标取加权平均值，可以计算出2011年对2005年的比值为1.5。随后，将非洲开发银行的取值区间（每天消费2~20美元）乘以1.5，得出每天消费3~30美元的取值区间。因此，本文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数据为计算基础，使用每天消费3~30美元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的取值区间。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3个阶层的取值区间分别调整为：“浮动阶层”（每天消费3~6美元）、“中下阶层”（每天消费6~15美元）和“中上阶层”（每天消费15~30美元）。另外，本文使用世界银行新修正的

① A. Banerjee and E. Duflo, “What is Middle Class about the Middle Classe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 No. 2, 2008, pp. 3-28.

② M. Ravallion, *The Developing World's Bulging (but Vulnerable)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816, 2009.

③ AfD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p. 1-5.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数据库 (PIP)^① 的国别数据来计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中产阶层情况。

(三) 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状况的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动态视角考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状况。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约 40 年为研究时间跨度, 选取 1981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9 年这 5 个时间点对该地区 44 个国家^②的中产阶层人口规模和比例进行分析, 其中近 20 年情况为研究重点。根据上文提及的中产阶层取值区间和数据库,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基本状况如下:

表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阶层人口数量 (万人) 和比例 (%)

时间 (年)	贫困阶层	中产阶层			富裕阶层
		浮动阶层	中下阶层	中上层	
1981	26 845 (69.40)	11 525 (29.73)			313 (0.81)
		7 270 (18.73)	3 566 (9.22)	689 (1.78)	
1990	36 809 (73.50)	12 979 (25.85)			296 (0.59)
		8 510 (16.92)	3 760 (7.51)	709 (1.42)	
2000	50 010 (76.78)	14 848 (22.79)			277 (0.43)
		9 923 (15.23)	4 185 (6.42)	740 (1.14)	
2010	58 129 (68.28)	26 336 (30.94)			667 (0.78)
		18 172 (21.35)	7 012 (8.24)	1 152 (1.35)	
2019	67 372 (61.99)	40 504 (37.26)			800 (0.74)
		27 641 (25.43)	11 013 (10.13)	1 850 (1.7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贫困与不平等平台”数据库 (<https://pip.worldbank.org>) 制作。

^① 世界银行“贫困与不平等平台”数据库 (<https://pip.worldbank.org>) 在原来“全球贫困在线”数据库 (PovcalNet) 的基础上, 2023 年 3 月根据物价指数、调研情况和家庭调查数据等修正了数据库里的国别数据。

^② 世界银行“贫困与不平等平台”数据库只包含撒哈拉以南非洲 44 国数据, 缺少赤道几内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南苏丹四国情况。

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变化特点

通过表 1 和表 2 可以发现, 2000 ~ 2019 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时期。该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的变化情况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在地区层面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整体实现较快增长, 区域间差异性和区域内同质性的现象较为明显。从人口比例来看, 1981 ~ 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1 ~ 2000 年该地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出现缓慢下降。这一阶段受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方案》负面结果的影响, 非洲经济增长迟缓, 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冲击下, 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下降 6.94 个百分点, 贫困阶层人口比例上升 7.38 个百分点。2000 ~ 2019 年该地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 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2000 年以来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减贫策略的实施, 该地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22.79% 上升到 2019 年的 37.26%, 增长 14.47 个百分点, 贫困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14.79 个百分点。

从人口数量来看, 1981 ~ 2019 年该地区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增加迅速。虽然 1981 ~ 2019 年该地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只增长了 7.53 个百分点, 但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却从 1981 年的 1.15 亿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4.05 亿人, 增长 3.51 倍, 明显高于这一阶段该地区的总人口增速 (2.81 倍) 和贫困阶层人口增速 (2.51 倍)。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区域的发展情况来看, 区域间的差异性较大, 而区域内的同质性现象较为明显。其中, 2000 ~ 2019 年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长较快的是西部非洲地区和东部非洲地区, 分别增长 22.06 个百分点 (从 20.57% 增长到 42.63%) 和 18.71 个百分点 (从 20.30% 增长到 39.01%), 中部非洲地区增长 12.55 个百分点 (从 13.06% 增长到 25.61%)。而南部非洲地区不仅没有增长, 反而下降 3.25 个百分点 (从 35.78% 下降到 32.53%), 这主要是因为津巴布韦、安哥拉、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和马拉维等国的降幅较大。2000 ~ 2019 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的也是西部非洲地区 (从 4 829 万人增长到 1.68 亿人) 和东部非洲地区 (从 4 017 万人增长到 1.31 亿人), 中部非洲地区的增速较快 (从 1 048 万人增长到 3 715 万人, 增长 3.54 倍), 而

南部非洲地区的增长较慢（从 4 954 万人增长到 6 873 万人）。^①

表 2 撒哈拉以南非洲 44 个国家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变化表 单位：%

国家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					增长情况 (2019 年减去 2000 年)
	1981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9 年	
塞内加尔	18.18	16.97	24.79	35.38	69.78	44.99
马里	5.7	6.42	11.93	23.90	54.68	42.75
埃塞俄比亚	16.21	11.92	12.00	28.71	50.48	38.48
冈比亚	16.64	16.10	28.14	49.50	65.37	37.23
贝宁	17.53	15.88	21.11	25.09	53.77	32.66
加纳	37.94	34.00	42.27	60.37	73.59	31.32
布基纳法索	6.74	7.27	12.06	22.67	38.39	26.33
乍得	9.29	15.23	11.40	38.42	37.40	26.00
纳米比亚	36.5	31.98	36.82	52.58	62.66	25.84
多哥	34.6	28.03	26.50	24.87	52.15	25.65
几内亚	2.01	2.13	20.27	20.92	45.67	25.40
莱索托	30.96	34.28	25.57	42.41	50.84	25.27
佛得角	16.26	24.95	60.72	78.07	85.84	25.12
几内亚比绍	-	-	20.82	16.31	45.58	24.76
科特迪瓦	82.39	61.71	46.23	43.68	69.66	23.43
斯威士兰	3.9	8.34	27.17	39.85	49.87	22.70
坦桑尼亚	8.24	11.58	4.75	21.31	26.77	22.02
尼日尔	16.29	8.34	7.84	18.09	28.24	20.40
塞拉利昂	19.43	15.30	10.01	18.58	28.84	18.83
乌干达	19.64	19.56	14.40	30.73	33.09	18.69
卢旺达	14.61	11.60	9.96	17.00	26.80	16.84
尼日利亚	33.87	24.62	15.99	29.85	32.38	16.39
博茨瓦纳	29.61	48.38	49.73	62.81	65.54	15.81
喀麦隆	41.2	35.87	42.80	47.75	57.80	15.00
刚果（金）	18.5	12.68	1.62	5.33	13.32	11.70

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区域中产阶层的数据是在表 2 的基础上结合各国人口数据加权计算而来。

(续表)

国家	中产阶级人口比例					增长情况 (2019年减去 2000年)
	1981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9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59.4	40.59	37.88	32.20	48.65	10.77
加蓬	84.2	81.01	78.02	78.04	88.45	10.43
南非	55.19	50.43	46.25	56.83	56.04	9.79
吉布提	84.43	74.71	55.38	61.44	64.56	9.18
莫桑比克	10.05	8.03	8.68	14.16	14.86	6.18
利比里亚	88.4	52.91	20.00	15.46	25.07	5.07
布隆迪	4.1	5.64	5.49	9.67	9.08	3.59
中非共和国	10.89	10.57	12.76	20.88	14.22	1.46
科摩罗	62.86	63.13	62.15	61.79	63.12	0.97
刚果(布)	26.59	29.05	24.61	34.68	25.49	0.88
毛里求斯	48.99	78.66	92.39	92.84	91.48	-0.91
苏丹	29.39	29.34	52.08	61.90	50.53	-1.55
塞舌尔	87.23	89.66	85.66	85.89	81.99	-3.67
马拉维	15.24	12.68	15.45	12.59	11.39	-4.06
赞比亚	38.37	31.88	30.13	23.06	25.76	-4.37
肯尼亚	48.54	50.20	37.90	34.49	32.33	-5.57
马达加斯加	24.55	18.58	16.46	9.87	10.64	-5.82
安哥拉	54.74	51.21	42.22	41.16	29.15	-13.07
津巴布韦	68.65	69.31	70.05	49.21	38.35	-31.7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贫困与不平等平台”数据库（<https://pip.worldbank.org>）制作。

第二，在国别层面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实现中产阶层的正增长，基数较低的国家增长速度较快，基数较高的国家增长质量较高。从增速来看，2000~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实现正增长的有35个国家。其中，增幅超过30个百分点的有6个国家，分别是塞内加尔、马里、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贝宁和加纳；增幅在20~30个百分点的有12个国家，分别是布基纳法索、乍得、纳米比亚、多哥、几内亚、莱索托、佛得角、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和尼日尔；增幅在10~20个百分点的有9个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乌干达、卢旺达、尼日利亚、博茨瓦纳、

喀麦隆、刚果（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加蓬。同一时间段内，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出现负增长的有 9 个国家。其中，津巴布韦降幅最大，从 2000 年的 70.05% 下降到 2019 年的 38.35%，降幅达 31.7 个百分点。

从人口比例来看，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超过 50% 的国家由 2000 年的 8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20 个。这 20 个国家分别是：毛里求斯（91.48%）、加蓬（88.45%）、佛得角（85.84%）、塞舌尔（81.99%）、加纳（73.59%）、塞内加尔（69.78%）、科特迪瓦（69.66%）、博茨瓦纳（65.54%）、冈比亚（65.37%）、吉布提（64.56%）、科摩罗（63.12%）、纳米比亚（62.66%）、喀麦隆（57.80%）、南非（56.04%）、马里（54.68%）、贝宁（53.77%）、多哥（52.15%）、莱索托（50.84%）、苏丹（50.53%）和埃塞俄比亚（50.48%）。

从各国发展情况来看，中产阶级人口基数较低的最不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较快，基数较高的国家增长质量较高。一些长期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坦桑尼亚、尼日尔、乍得、马里、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贝宁、塞内加尔、多哥和冈比亚等国，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在 2000~2019 年期间增幅超过 20 个百分点。一些中产阶级人口基数较高的国家，如毛里求斯、塞舌尔、加蓬、吉布提和南非等国，虽然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在 2000~2019 年期间增速出现放缓或者停滞，但通过观察这些国家各阶层的数据变化，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已经进入较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大量人口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例如，毛里求斯的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虽然从 2000 年的 92.39% 下降到 2019 年的 91.48%，但其富裕阶层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1.97% 上升到 2019 年的 7.16%，中上阶层从 2000 年的 9.44% 上升到 2019 年的 23.38%。塞舌尔、加蓬、吉布提和南非等国也是类似情况，大量人口实现了阶层的跃升，而且南非中产阶层的种族结构日趋合理，黑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和数量正在快速增加。^①

第三，在阶层分布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都出现了积极向好的变化，阶层人口分布呈现由“金字塔型”向“纺锤型”结构的逐渐转变。从各阶层人口数量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浮动阶层人口数量从 2000 年的

^① R. Southall,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in South Africa*, Auckland Park: Jacana, 2016, pp. 41 - 63.

9 923 万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2.76 亿人（增长 2.79 倍），中下阶层从 2000 年的 4 185 万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1.10 亿人（增长 2.63 倍），中上阶层从 2000 年的 740 万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1 850 万人（增长 2.5 倍），明显高于同时期该地区的总人口增速（1.67 倍）。虽然浮动阶层依然占到中产阶层的大多数，但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的人口比例和数量也实现了较大增幅。这也表明，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增长仅仅是浮动阶层增长”^①的观点并不准确，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除了浮动阶层实现较大增长之外，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的成长比例也不小，而且增速不低。

从各阶层人口分布来看，虽然就整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的人口分布依然呈现较明显的“金字塔型”结构，但是贫困阶层人口比例大幅减少，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贫困阶层人口比例超过 50% 的国家由 2000 年的 35 个减少到 2019 年的 23 个，中产阶层人口比例超过 50% 的国家由 2000 年的 8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20 个，一些国家的阶层人口分布已初步呈现“纺锤型”结构，这也预示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人口分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虽然少数国家的浮动阶层占比较大（如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冈比亚等国 2019 年浮动阶层占比超过 40%），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但是其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也实现了较快增长，表明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抗冲击能力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 2000 年以来的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显著增长和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大多数国家实现中产阶层的正增长，阶层人口分布呈现积极变化，少数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方面共同体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正在崛起的发展态势。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原因

独立初期，撒哈拉以南非洲曾出现过一次中产阶层的成长，但其总体规模较小、群体构成较为单一。至于部分国家这次成长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

^① D. Darbon, “Turning the Poor into Something More Inspiring: The Creation of the African Middle Class Controversy”, in L. Kroecker, D. Kane and T. Scharrer eds., *Middle Classes in Africa: Changing Lives and Conceptual Challenges*, p. 42.

为是实施了国有化和本土化政策，将一些外国的石油、银行和保险等企业国有化，将文职政府机构非洲化，将一些外国人拥有的资产、财产和就业岗位等转移到当地人手中，如卡翁达时期的“赞比亚化”运动、蒙博托时期的“扎伊尔化”运动和尼日利亚实行的《企业促进法令》（Enterprises Promotion Decree）等。这些政策使大量当地人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获得就业岗位，并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固定收入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在当地人中产生了一些被称为“买办阶层”的外国企业代理人。^① 2000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和人口数量上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职业范围更加广泛，群体构成更加多元，驱动因素也更为复杂。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具特点，所以其增长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就整体而言，2000 年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五方面。

（一）独立自主的地区发展战略为中产阶级崛起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非洲人民逐渐意识到，只有通过自主发展，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进入 21 世纪，非洲联盟的成立是非洲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在非盟的推动下，非洲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自主发展战略，实施了诸多聚焦发展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非洲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了非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 2001 年非洲自主制定的一项全面发展战略，旨在解决非洲面临的贫困加剧、经济落后和边缘化问题。其中，该计划明确提出在 15 年内实现并维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7%、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等目标。^② 到 2015 年，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极端贫困人口比例明显下降。^③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实施成效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它在农业、卫生、教育、环境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非盟《2063 年议程》是 2013 年非洲自主提出的一个长远发展愿景，展示了非洲未来 50 年的发展蓝图，将通过 5 个十年规划来建设一个团结、繁

^① D. Resni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s Emergent Middle Cla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7, No. 5, 2015, pp. 576–578.

^②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 October 2001, p. 14.

^③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2023–12–20。

^④ AU, *Building the Africa We Want: NEPAD Turns 20*, African Union, January 2021.

荣与和平的非洲。相关报告显示，非洲在首个十年规划期间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经济一体化方面，增强了非洲经济能力，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计。^① 2024年2月，《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规划发布，为非洲下一个十年的加速发展指明方向。^②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作为非盟《2063年议程》的旗舰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和增强区域价值链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92.3%的商品原产地规则达成一致，确立了农产品加工、汽车、制药和物流4个优先行业，^③ 为进一步激发非洲内生动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总之，自主发展战略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提供了多领域、多层次的有利条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将继续走在推动非洲发展和激发非洲活力的前列”^④。

（二）政治相对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前提条件

刚果（金）和喀麦隆学者在一篇关于非洲中产阶级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章中指出，政治稳定对于非洲中产阶级的增长至关重要，它是其他驱动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中产阶级的增长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保证了中产阶级的存在和壮大，实证结果显示出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同非洲中产阶级的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西式民主与中产阶级的增长却显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⑤ 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国家治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的增长有着积极且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居多的欠发达国家，国家治理对人均收入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⑥ 另有相关研究显示，国家治理和法治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撒哈拉以

① AUDA - NEPAD, *Annual Report 2023*, African Union Development Agency - NEPAD, December 2023, pp. 6 - 7.

② AU, *Agenda 2063: Second Ten - Year Implementation Plan (2024 - 2033)*, African Union, February 2024.

③ AfCFT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fCFTA on the AU Theme of the Year 2023*,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ebruary 2024, pp. 9 - 11.

④ AUDA - NEPAD, *Annual Report 2023*, p. 7.

⑤ O. Kodila - Tedika, S. A. Asongu and J. M. Kayemb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Vol. 30, No. 4, 2016, pp. 527 - 549.

⑥ Bichaka Fayissa and Christian Nsiah,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47, No. 1, 2013, pp. 91 - 108.

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具体而言,在同等条件下,综合治理指标每提高一个单位可以促进人均收入提高 23.2 个百分点,而“发言权与问责制”指标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西式民主和新闻自由并不能显著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①通过“易卜拉欣非洲国家治理指数”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0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综合治理指数得分实现了较大提升,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得分提升较为明显。其中,科特迪瓦、多哥、塞舌尔、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安哥拉、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和乍得等国的综合治理得分提升较多,^②通过表 2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级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而津巴布韦和安哥拉出现中产阶级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众大量返贫。

(三) 经济持续增长和私营部门繁荣是中产阶级崛起的核心动因

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对该地区中产阶级的崛起非常重要,过去 20 年整个非洲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减少了各国贫困阶层的比例,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③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与非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④通过世界银行的数据可以看到,2000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的持续稳定增长,2000 ~ 2019 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4.3% (世界平均值为 3.1%)。其中,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莫桑比克、乍得、坦桑尼亚、吉布提、乌干达、加纳、塞拉利昂、赞比亚、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安哥拉、斯威士兰、尼日尔、佛得角、马里、刚果(金)、贝宁、几内亚和马拉维等 21 国 2000 ~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4.3%。通过表 2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而莫桑比克、马拉维和赞比亚等个别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出现了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的情况。莫桑比克、马拉维主要是由于其人均收入的起点太低,即

① K. D. Adzima and K. E. Baita,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9, pp. 6-7.

② Mo Ibrahim Foundation, *2015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 2015; Mo Ibrahim Foundation, *2022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 2023.

③ AfD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14.

④ T. Němeková, J. Harmáček and M. Schlossarek, “Measuring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 Income Versus Assets Approach”, *Afrika Spectrum*, Vol. 55, No. 1, 2020, pp. 19-21.

使经济增速较快，但人均收入依然较低；而赞比亚经济则主要依靠资源出口，内生动力不足使得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缓慢。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也被认为是200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私营部门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增加投资、提升效能和创造就业等方式为非洲经济注入新动力，在私营部门发展越好的非洲国家，其中产阶层的整体规模往往越大。^① 2000年以来，加纳、尼日利亚等国的私营部门发展迅速，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如餐饮业、零售业、建筑业、通信业和旅游业等部门。虽然大部分属非正式部门就业，但这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减少了极端贫困，也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增长，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侨民返乡工作和创业。

（四）基础设施改善和生育率降低等社会发展因素构成中产阶级崛起的“催化剂”

基础设施改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尼日利亚学者的一项包括49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改善对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供电、通信、供水和卫生等基础设施领域。^② 另一项包括33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降低了非洲国家的贫困水平，道路基础设施每增加10%，贫困人口比例、贫困深度和严重程度分别下降5.16%、6.14%和6.91%。^③ 也有学者通过对31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穷人比富人从基础设施中获得的收益更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缩小该地区的收入差距。^④ 非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也显示，基础设施越好的非洲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中产阶级，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①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20: Innovative Finance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20; AfD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14.

② D. Ekeocha, J. Ogbuabor and A. Orji, “Public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frica: A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Vol. 55, 2022, pp. 931 – 950.

③ J. Anyanwu and A. Erhijakpor, “The Impact of Road Infrastructure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Poverty in Africa*, 2009, p. 2.

④ O. Mutiiria, Q. Ju and K. Dumor, “Infrastructure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Sub – Saharan Af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0, 2020, pp. 1 – 21.

和促进贸易发展，为中产阶级提供更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创收机会。^①

生育率的降低也被认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增长的重要因素。塞内加尔学者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高生育率长期制约着非洲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生育率的降低有效提高了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发挥促进作用。^② 美国和非洲学者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生育率下降是推动非洲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内在机理在于：生育率下降能够有效减轻农村家庭负担，缩小农村家庭规模，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家庭种植向更商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人均收入。^③ 另有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0~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从 5.72 下降到 4.73。结合表 2 可以发现，2000 年以来生育率下降较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级的较快增长，如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乌干达、卢旺达、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比绍等国。同理，生育率较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其中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较高，如毛里求斯、佛得角、塞舌尔、南非、博茨瓦纳、吉布提、加蓬和加纳等国。

（五）减贫成效显著成为中产阶级崛起的“加速器”

2000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调动内外资源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普及基础教育、加大扶贫投入、促进性别与收入平等、改善社会服务和医疗保障等举措，积极推动减贫事业。这些减贫举措促进了农业较快增长，有效降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农业增长的减贫成效是其他行业的 2~3 倍，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加纳等国的农业增长对其减贫做出很大贡献^④），创造了更多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大量贫困人口从中获益，并使该地区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贫困率（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从 2000

① AfD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14.

② S. A. Mbade, “Fertility in Africa: Dynamics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 18, No. 13, 2022, pp. 43–53.

③ T. Jayne, J. Chamberlin and D. Headey, “Land Pressures, the Evolution of Farming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frica: A Synthesis”, *Food Policy*, Vol. 48, 2014, pp. 1–17.

④ K. Beegle and L. Christiaensen eds., *Accelerating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World Bank, 2019, p. 67.

年的 56.5% 下降到 2019 年的 35.4%。^① 当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一直是国际减贫合作的重点地区，2000 年以后国际减贫合作目标从“千年发展目标”迈进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对非减贫合作模式从“南北合作模式”向“南北合作模式”“南南合作模式”并行发展。^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通过创设合作平台、建立伙伴关系、放宽市场准入、提供科技和金融支持、减免债务和国际援助等方式持续推动对非国际合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国际对非合作有效推动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吸引国际资金、技术和经验，提高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加速了其建设进程。^③ 中国和美国学者的一项包括 47 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援助能有效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当援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 0 ~ 69% 之间时，援助能较好促进非洲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当比值为 27% 的时候援助对非洲受援国的经济促进作用最大。^④

四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中产阶层各具特点，要分析其影响并不容易。但该地区在 2000 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一定同质性的阶层，其产生的影响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⑤ 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623 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 690 美元，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 2000 年的 3.5 亿人增长到 2022 年的 6.7 亿人，^⑥ 人均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群体的扩大正推动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出口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人口红利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始显现^⑦。中产阶层正

①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23-12-20。

② 安春英：《全球贫困治理中的非洲减贫国际合作》，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10 期，第 23 ~ 28 页。

③ World Bank,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0.

④ J. Cai, Z. Zheng, R. Hu, C. Pray and Q. Shao, "Has International Aid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3, 2018, pp. 239-251.

⑤ T. Scharrer, D. O' Kane and L. Kroeker, "Introduction: Africa's Middle Classe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L. Kroeker, D. Kane and T. Scharrer eds., *Middle Classes in Africa: Changing Lives and Conceptual Challenges*, pp. 1-24.

⑥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23-12-20。

⑦ 梁益坚、王锦：《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及国家政策取向》，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6 期，第 55 ~ 58 页。

在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并开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该地区国家数量众多、发展程度不同，各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发生作用的方式、层次、深度和广度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和挑战。

（一）政治层面的影响

第一，促进政治稳定。2000 年到 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标中增长幅度超过 0.4 的国家有卢旺达、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安哥拉、几内亚、纳米比亚、刚果（金）、塞内加尔、乌干达、苏丹和加纳 11 国，这 11 国中产阶层的比例平均增长 16.73 个百分点（该地区平均增长 14.47 个百分点），同时期这 11 国的“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标平均增长 1.08。^① 这一数据结果也符合“中产阶层增长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② 的相关研究结论。美国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认为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社会结构由大量贫困阶层为主的“细长金字塔型”转变为中产阶层不断增长的“钻石金字塔型”，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在缓和冲突、促进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一个较稳健的政治治理体系。^③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独立初期出现的中产阶层以依赖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为主，而 2000 年以来兴起的中产阶层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前者需要维护政府各项政策来维持其中产阶层的地位，而后者则通过更强的经济独立性来促进政治稳定和提升治理能力。^④ 加纳裔学者哈米杜通过对加纳的 2008 年选举、2012 年选举等案例分析后指出，加纳的中产阶层在维护该国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锋作用。^⑤

① 参见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https://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2023-12-20。

② A. Alesina and R.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Vol. 40, No. 6, pp. 1203-1228.

③ 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p. 69-105.

④ Michael Lofch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frican Middle Class”, in M. Neube and C. L.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26.

⑤ J. Hamidu, “Ghanaian Diaspora as Emerging ‘Global Middle Classes’: Linking Middle Clas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tability in Ghana”, in U. Engel and M. J. Ramos eds., *African Dynamics in a Multipolar World*, Brill, 2013, pp. 1043-1080.

第二，扩大政治参与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在追求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明显增强。他们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更高，更多集中于私营经济部门，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他们有了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和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由此，他们参与政治决策，促进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参与政治监督，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参与政治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参与国际合作，拓展海外资源和提升国际影响力。例如，尼日利亚中产阶层在2000年以来快速增长，其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不断增加，社交媒体也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影响力不断扩大。2014年4月，尼日利亚276名女学生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尼日利亚中产阶层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带回我们的女孩”运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促使尼日利亚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派遣军队前往“博科圣地”的基地去营救被绑架的女孩。^①另外，南非的中产阶层近年来积极参与了“学费必须下降”和“罗德斯必须倒下”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②加纳在2014年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和持续停电引发了抗议活动，中产阶层积极参与并成立了多个社会团体，通过向总统递交请愿书等非暴力方式参与国家治理。^③

第三，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非洲民主化发展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一些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一定适应本土的国情和传统。西式民主在非洲的历史实践出现诸多问题，有时甚至成为动乱的根源，对民主的定义应该更加包容和多元，民主的实践也并非只有西方民主一种形式，非洲的民主须结合自身的特殊条件。^④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政治民主意识也逐渐加强。如果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期望非洲中产阶层继续照搬西式民主，那么他们可能就要失望了。^⑤新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更加关注本土化的政治概念和实践，更加注重探索与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① N. Orji, “Middle Class Activism in Nigeria”, pp. 139 – 141.

② J. Musyoka, “South Africa’s Black Middle Classes Between 2009 and 20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1, 2023, pp. 75 – 85.

③ A. Noll and J. Budniok, “Social Protest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Ghana: 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of Three Cas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1, 2023, pp. 13 – 27.

④ 李安山：《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内涵及其实践》，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24页。

⑤ S. K. Hellsten,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African Middle Class”, in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p. 107.

的民主形式，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模式或全盘西化。西方民主植根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理性，而非洲本土民主注重融合本土文化和社会传统制度，更强调集体主义、部落身份和社会和谐。例如，有研究认为，诸多坦桑尼亚人更愿意以集体主义的态度来解释人权和民主，而不是以个人主义的视角来解释。^① 2011 年非洲联盟在结合非洲文化传统、非洲哲学、泛非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非洲共享价值观”（Africa shared values）^②，正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这也表明在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更加注重本土化元素的重要作用，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本土国情的民主形式。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在政治层面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中产阶级与政治精英形成政治联盟，可能导致腐败增加和阶层固化。在少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权力被一些政治精英掌握，中产阶级增长主要集中在特定群体和地区，他们与政治精英形成彼此依附的政治联盟，并通过政治资源巩固自身利益，这增加了腐败行为，并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③ 例如，南非黑人中产阶级与非国大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政治联盟关系。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黑人中产阶级是非国大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资助者；非国大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提高黑人经济社会地位的政策，黑人中产阶级是主要受益者，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非国大的政策支持。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话题，面临诸多质疑和批评（如形成裙带关系、资源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手中、黑人贫困阶层获益较少等等）。^④

（二）经济层面的影响

第一，促进消费市场的扩大。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从 2000 年的 3 203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47 万亿美元。^⑤ 即使在 2008 ~ 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①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pp. 94 - 102.

② 关于“非洲共享价值观”情况，参见李安山：《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内涵及其它实践》，第 3 ~ 26 页。

③ M. Bratton and N. Walle, “Neopatrimonial Regime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4, 1994, pp. 453 - 489.

④ R. Southall,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in South Africa*, pp. 23 - 97.

⑤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2023 - 12 - 20。

中产阶层的消费支出依然快速增长，表现出惊人的弹性。^① 中产阶级被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消费社会形成的主要驱动力量。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产阶级拥有较稳定的工作，随着其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他们能够消费得起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包括用于家电、汽车、住房、教育、健康、旅游和娱乐等消费，这也在促进着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近年来，几乎每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冰箱、电视机、汽车、摩托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量都大幅增长，特别是汽车、摩托车拥有量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这也与中产阶级规模扩大有直接关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手机数量从2000年1 100万部增长到2022年的9.9亿部，增速惊人；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69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702亿美元。^② 全球主要的零售商和大型国际银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也表现出很强的信心，近年来在该地区广泛建立分支机构和扩大业务规模。在拉各斯、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达喀尔和阿克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城市，数量激增的购物中心、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和相继建成的城市快速路也展现出非洲经济的蓬勃活力。

第二，助力“非洲制造”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增长在扩大消费市场之后，必然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进入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些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意愿，他们创办中小微企业，为非洲实体经济增添动力。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扩大在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领域的投资规模，为非洲资本市场注入活力。一些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更容易接触最新科技前沿，能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带来更多创新型企业 and 科技型企业，培育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目前，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犹如星星之火，尤其集中在互联网、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等领域，促进了非洲本土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优化。2000年到2022年，该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从590亿美元增长到2 300亿美元，服务业增加值从2 100亿美元增长到9 604亿美元。^③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现代制造业、创新产业和服务业正逐

① C. Lufumpa, M. Mubila and M. Aïssa, “The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in M. Ncube and C.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56.

②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en>, 2023-12-20。

③ 同上。

渐成为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中产阶级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是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将为非洲工业化、现代化和一体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助力“非洲制造”的蓬勃发展。

第三，扩大人才需求和促进人才培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推动着人才需求的扩大和升级，对于信息技术、工程建设、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中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使得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管理才能、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的人才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兴市场上重要资源，在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还出现了海外人才返乡工作和创业的“人才回流”现象。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会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他们愿意为子女教育和自己的职业发展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研究显示，在加纳、毛里求斯、佛得角、塞舌尔和南非等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较高的非洲国家，学前教育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60% 以上。^① 2000 年到 2020 年，该地区的小学入学率从 80.3% 增长到 99.6%，中学入学率从 25.6% 增长到 44.4%，高等教育入学率从 4.4% 增长到 9.6%，青年识字率从 66.6% 上升到 77.9%。^② 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满足了中产阶级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教育领域的这些进步使该地区增加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主义的倾向也在非洲大陆蔓延，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以炫耀性消费为表现形式的过度消费现象，这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南非的新兴黑人中产阶级被媒体称为“黑钻石”（Black Diamonds），他们中间流行着一种满足其攀比心和虚荣心的炫耀性消费方式，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名牌服装、豪华汽车、珠宝、精品酒店、豪宅、奢华旅游和最新科技产品等炫耀性消费的内容。当他们的消费支出超出收入水平的时候，南非公司又专门推出了一系列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使得该群体的个人债务激增，并造成一部分中产阶级返贫。^③ 另外，在刚果（布）和刚果（金）等国流行着一种以购买、搭配名牌服饰为乐的“萨普”（Sape）文化，有些名牌服饰常常一件就需要成千上万美元。其中，一些萨普们在享受衣着

① M. Neube and C. L.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284.

②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en>, 2023-12-20。

③ H. Melber eds., *The Rise of Africa's Middle Class: Myths, Realities and Critical Engagements*, pp. 170-186.

光鲜的荣耀后，会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另外，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倾向蔓延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三）社会层面的影响

第一，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增长，正在改变着数量庞大的贫困阶层与少数富裕阶层之间长期对立的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社会稳定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和数量的增长正在推动政府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实现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近年来，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积极建立社会安全网，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粮食补贴、学校供餐计划、社会养老金和应急响应计划等为贫困人群提供社会安全保护。统计显示，该地区国家平均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用于社会安全网建设（接近全球平均的1.6%），平均每个国家实施了15项社会安全网相关的计划，其中乍得和布基纳法索实施了54项和56项。^① 相关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安全网在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包容、提高受助者自尊自信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展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建立和实施这些计划方面的创新和领导力。^② 在社会改革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崛起也正促使政府更加关注社会保障、破解发展难题和改善社会环境。目前，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完善社保制度、减少贫困人口、加强环境保护等内容，这些改革措施为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了更加稳定公平的发展环境。例如，卢旺达的社保已覆盖85%以上的人口，拥有医保的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43.3%增加到2020年的90.5%。科特迪瓦推出新的自营职业者社保方案，计划在2025年将社保覆盖率扩大到50%。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制定了保护劳动者的相关法律措施。^③

第二，促进改善公共服务与卫生健康服务。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他们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快速增加。不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改善交通、医疗、教育、能源、供水、安全和社区等方面的状况，以满足民众的需求，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服

① M. Das and S. Espinoza, *Inclusion Matters in Africa*, World Bank, 2020, pp. 127 - 129.

② Ibid.

③ ISSA,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 Africa 2023*, 2023, pp. 10 - 69.

务水平。从 2000 年到 2021 年，该地区的通电率从 25.7% 上升到 50.6%，城市通电率从 61.6% 上升到 80.7%。^① 非盟与非洲各国也在协同推进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境互联互通铁路公路网建设，目前一大批铁路、公路和轻轨项目已经建成通车或正在稳步推进。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其在卫生健康方面也开始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中产阶级通常更加关注健康问题，愿意在传染病、孕产妇健康和慢性病等方面投入更多，这也逐步推动着非洲健康卫生工作从传染病（艾滋病等）向慢性病、老年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防治的转变。2000 年到 2020 年，该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51.3 岁增长到 60.8 岁，传染病、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② 与此同时，医疗保健用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卫生保健部门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部门，正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出现了提供医疗保险的私立医疗机构，这进一步扩大了医疗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成为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

第三，减少贫困与促进性别平等。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人口比例的增长也预示着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人口比例正在下降。该地区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务农为生，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形成以中产阶级为纽带的城乡协同发展，通过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进一步降低贫困率。2000 年到 2020 年，该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从 2.1 亿人增长到 4.8 亿人，城镇化率从 31.4% 增长到 41.3%。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该地区的性别差距也正在缩小。2000 年到 2020 年，该地区女生的小学入学率由 73.7% 上升到 97.6%，女生的中学入学率由 22.7% 上升到 42.1%，女生的大学入学率由 3.6% 上升到 8.4%，女生与男生的中学入学率比值由 0.8 上升到 0.9，女生与男生的大学入学率比值由 0.69 上升到 0.79，^③ 这也表明女生的中学、大学入学率正在接近男生。非盟等区域组织通过制定并监督实施《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来推动妇女赋权运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政策法规，重点保障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土地权、继承权和政治参与权，并为她们提供职业培训和小微贷款，保障她们在教育和工作领域不受到歧视及不公待遇，努力减少童婚等现象，加快实现性别平等。

①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23-12-20。

② 同上。

③ 同上。

第四，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中产阶层的增长正在激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休闲娱乐市场，促进非洲本土文化的创作创新和发展繁荣。例如，尼日利亚的“诺莱坞”（Nollywood）在2000年以来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而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好莱坞）和印度（宝莱坞）的世界第三大电影王国，每年出品约2 000部影视作品，凸显“多族群、多文化、多语言”的非洲特色，展现非洲人民的精神风貌，这些影视作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另外，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语电影也在蓬勃发展，现每年出品500部以上的影视作品，在东非斯瓦希里语地区广受欢迎。当地民众认为，斯瓦希里语电影用一种更接近本土观众的文化艺术形式，能够反映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是用非洲的方式在讲述非洲的故事。^①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现社会两极分化扩大的现象。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增长弹性”不如其他发展中地区，因此在人均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将面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较大风险。^② 尽管中产阶级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但在少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崛起并没有带来整个社会的普遍繁荣，反而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在一些非洲城市，许多中产阶级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彰显其社会地位，而贫困阶层却在污水横流的贫民窟里苦苦挣扎，中产阶级的富裕与贫困阶层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引发不满情绪、犯罪率上升和社会动荡，并削弱非洲传统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五 结语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短期冲击，但该地区中产阶级崛起的积极因素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此其崛起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未改变。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该地区中产阶级的浮动阶层在外部冲击下仍然存在较大的脆弱性，有返贫的风险，发展基础还需进一步夯实。因此，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巩固和扩大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提高治国理政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

① V. Shule, “The Middle Class of Dar es Salaam and Kiswahili Video - films”, pp. 190 - 199.

② M. Neube and C. L. Lufumpa eds.,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Africa*, p. 93.

国家需要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放在重要位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警惕西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言论，实证研究显示“西式民主”“新闻自由”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级崛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①。二是持续激发内生潜能和提升开放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长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发展不均衡、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等问题，它们可利用自身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优势，转变外资集中于采掘业、外贸集中于初级产品的现状，引导资金从采掘业流向制造业，激发内生潜能。同时，它们亦需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抓住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新机遇，促进内外贸易的新发展。三是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和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近年，大量农村青年人涌入城镇，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民众收入。同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向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开展技能培训，降低青年失业率和犯罪率，这可为中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保障。四是大力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该地区国家需构筑区域产业链和贸易网络，避免区域内的产业趋同、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在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壮大。

总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崛起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长期趋势，对区域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上，中产阶级崛起将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提高地区生活水平和质量，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更加注重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审慎看待“西式民主”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实际效果。在世界层面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级崛起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动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和平衡发展，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破除对“西式现代化”的迷信和崇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将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中产阶级一起为“全球南方”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K. D. Adzima and K. E. Baita,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pp. 6-7.